

保加利亞的民主化進程及其困境

洪茂雄

(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兼國際共黨組副召集人)

一、前言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日，在位長達三十五年並已屆七十八歲高齡的保加利亞共黨（以下簡稱保共）總書記兼國務委員會主席（即國家元首）的日夫可夫（Todor Zhivkov），於事先並無任何徵兆下，也緊跟著東德共黨總書記兼國務委員會主席何內克（Erich Honecker）宣告垮台。這位在東歐國家中掌權最久的共黨領導人，其突然被解職，不僅反映保共內部權力結構發生問題，而且也開啟了保加利亞和平演變的序幕。從日夫可夫的繼承者姆拉德諾夫（Petar Mladenov）開始改弦易轍後，歷經保共的全盤換血，和舉行自由選舉，建立政黨政治，致使保加利亞整個改革進程展現理性而穩健，予人刮目相看。保國的民主化過程與政經體制改革範圍遠遠超出當初保共改革派和一般西方觀察家意料之外。索菲亞居然會出現所謂「第二波革命」的壯舉，在東歐國家「非共化」進程中，情況堪稱特殊，亦頗具研究價值。

本文探討的重點，擬從保加利亞民主化的背景著手，然後由縱橫面來觀察其民主化進程的具體作為與特徵，再就保國和平演變之後面臨的困境，如何調適和克服，做扼要的剖析，俾使保加利亞的新貌得以比較清楚和完整呈現在讀者面前。

二、保加利亞基本資料

(一) 地理環境和民族分佈

保加利亞的地理位置，北鄰羅馬尼亞，南接希臘與土耳其，西靠塞爾維亞和馬其頓，東瀕黑海。其土地面積有十一萬零九十二平方公里，人口依一九九〇年統計共九百十四萬六千人；境內人口分佈，百分之七十集中在城市，百分之三十散居鄉

村地區，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分佈情形剛好相反。^①

保加利亞並不是單一民族的國家，境內主要民族以保加利亞族最多，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其次是土耳其族，約占百分之十，係鄂圖曼帝國統治保加利亞時留下的後裔。其他少數民族尚有馬其頓人、亞美尼亞人、希臘人、吉卜賽人、猶太人、俄羅斯人和日爾曼人等。^②官方語言為保加利亞語，屬斯拉夫語系，與俄羅斯語甚接近，很容易相互溝通。保加利亞人傳統上是信奉東方正教，但土耳其裔則信仰回教，其他宗教信仰尚有天主教、基督教及猶太教等。在共產黨掌權時期，宗教活動幾乎受到刻意壓制。同時對少數民族的政策，顯然有違背人權的事實。保共採雙重標準，比較善待同屬斯拉夫族的少數民族及在數量上不足以構成威脅的其他少數民族。但對既非同種又非同宗教信仰，人口近百萬的土耳其裔則一向有所疑懼，採取相當欺壓措施。其所實用的手段，一方面迫使土裔移居土耳其，另一方面強制實施同化政策。例如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二年約有二十五萬土裔被迫湧入土耳其；從五〇至七〇年代，據估計亦有近二十八萬人之多。^③由於土耳其族生育率高，保國境內土裔仍維持一定的比例。在具有歧視性的民族政策下，土裔有如二等公民，大部分從事農耕或其他勞力性職業，所得待遇自然比不上保加利亞。再者，保共政府自七〇年代初起，即停止在學校專設土耳其語文課程，並干擾回教禮拜活動，禁止土語廣播節目和土文報刊。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五年間，土裔更被迫更換為斯拉夫姓名，有為數不少土裔因反抗而被保加利亞軍警殺害，導致國際輿論的關切。^④為此，戰後以來，索菲亞和安卡拉之間經常相互攻訐，土國政府至表不滿。直到一九八九年以後，隨著政治改革運動的興起，保國政府對待土裔的歧視政策，始有顯著的改善。

(二) 歷史背景

保加利亞歷史，可謂一部爭取獨立的奮鬥史。因其位於歐亞交通必經要道，戰略地位重要，成為兵家必爭之地。在歐洲歷史上歷經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等三大強權的統治。今日保加利亞領土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紀即有色雷斯人(Thracians)在此活動。公元四十年以後，這個地方納入羅馬帝國管轄範圍，到三九五年改屬拜占庭帝國版圖。公元七世紀，保加利亞族的祖先布爾加人(Bulgars)由高加索北部西遷和自多瑙河北岸南下的斯拉夫戰勝拜占庭帝國，建立了保加利亞國家(史稱第一保加利亞王國)。^⑤因布爾加部族人數不多，逐漸被斯拉夫民族同化，遂成為斯拉夫民族的一支。保加利

註① Der Fischer Weltatmanach 1992 (Frankfurt a. M.: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91) p. 245.

註② Ibid.

註③ Osteuropa Nr. 3 / 90 pp. 248~254.

註④ Osteuropa Nr. 10 / 89, pp. 560~569.

註⑤ Edgar Hoesch, *Geschichte der Balkanländer* (Stuttgart: W. Kohlhammer Verlag, 1968) pp. 31~34.

亞自公元六八一年立國後，國勢日強。一〇一八年再度被拜占庭帝國侵占。一一八五年建立了第二保加利亞王國。⑥至一三九六年，保加利亞王國被鄂圖曼帝國併吞，為時長達五百年之久。

一八七七年俄土戰爭爆發，俄軍進入保加利亞，擊敗土耳其軍隊，俄軍首次協助同種族，同宗教信仰的保加利亞復國。在一八七八年三月簽訂的聖史提法諾條約(The Treaty of San Stefano)中，土耳其承認保加利亞獨立，並將馬其頓及色雷斯割讓給保國。但後來被歐洲列強否決。一九〇八年當鄂圖曼帝國發生「青年土耳其」革命之際，保加利亞正式脫離土耳其人的控制。一九一一年義大利與土耳其爆發戰爭，巴爾幹各王國有機可乘，共同組成「巴爾幹聯盟」(Balkan League)，包括保加利亞、希臘、蒙特尼哥羅及塞爾維亞等國。於次年史稱的「第一次巴爾幹戰爭」中擊敗土耳其，而瓦解了鄂圖曼帝國長期的統治。但聯盟國之間為了分配占領土地引起衝突，又發生了所謂「第二次巴爾幹戰爭」。在這次戰爭中，保國受到希臘、塞爾維亞和羅馬尼亞的圍攻，被迫求和，簽訂「布加勒斯特條約」，喪失部分領土。⑦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與德國結盟，企圖奪回第二次巴爾幹戰爭時的失土。惟一九一八年德、奧戰敗後，在和約中，保加利亞除償付戰爭賠款外，又喪失了更多領土。第一次大戰後，保加利亞改行君主立憲，一九一九年國會大選，農民黨取得多數席位，由黨魁史坦波利斯基(A. Stambolisky)組閣執政。史氏不只是保國農民黨領袖，也是「綠色國際」(Green International)發起人之一。「綠色國際」是由歐洲各國農民黨組成，藉以與甫由共產黨組成的「赤色國際」(即「共產國際」又稱「第三國際」)相對抗。⑧史氏在內政上勵精圖治，建樹甚多，尤其在土地改革和推動公共建設方面相當成功，堪為東歐楷模。可惜，史氏政敵不少，有左派的共產黨(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和極右派的軍官集團，彼此相互勾結，於一九二三年六月發動政變，史氏遇害。此後保國政局即陷入動盪不安，尤其以「馬其頓革命組織」(IMRO)的恐怖主義團體最橫行霸道，幾乎使政府束手無策。⑨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保加利亞加入軸心國集團。一九四一年六月德蘇戰爭爆發，但索菲亞却拒向莫斯科宣戰，其理由乃因保加利亞人對俄國曾協助其從土耳其人手中解放出來，一直心存感激。不過，保國政府仍提供德軍使用黑海沿岸的港口以對俄作戰。一九四二年七月，反納粹運動崛起，保共與農民黨聯盟組成「祖國陣線」，展開反政府活動。一九四四年九月五日，蘇聯深恐保國落入西方勢力範圍，乃倉促對保加利亞宣戰。紅軍幾乎在無抵抗下進入保境。九月九日，「祖國陣線」

註⑥ Ibid., p. 57.

註⑦ Ibid., pp. 117~121.

註⑧ Ibid., p. 123.

註⑨ Ibid., 129.

配合紅軍攻勢，發動政變，由非共人士喬治也夫 (K. Georgian) 組成「祖國陣線」聯合政府。隨後大舉清除親納粹派分子，以及前任政府高級官員、議員和許多非共知識份子近三千人被處決。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依照三強雅爾達會議決定，舉行自由大選，由莫斯科幕後支持的「祖國陣線」獲勝。一九四六年九月，舉行公民表決，通過廢除君主政體，宣告建立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廢王西梅翁二世 (Simeon II) 放逐國外。十月二十七日舉行制憲議會大選，農民黨及其他政黨，如社會民主黨等，雖都積極參加，但遭共產暴力阻止，所提候選人在選前即遭逮捕入獄。保共隨即上台掌權，由其領袖季米特洛夫 (Georgi Dimitrov) 出任第一任部長會議主席。從此，保共開始清算異己，許多在野黨派的領導人都被以莫須有的罪名判刑或處決。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國會通過新憲法，取代一八七九年頒行的舊憲法。宣佈私人企業和礦山實行國有化，農業則採合作化。⑩保加利亞在保共一黨專政的統治下，一切以克里姆林宮馬首是瞻，是蘇聯在東歐國家中最忠誠的盟友。

三、民主化的背景

保加利亞在一九八九年東歐民主化運動中，表現不俗，順利地踏上了「民主列車」，正向前邁進。惟觀察其過去近半個世紀在共黨統治下，却未曾如其它東歐國家一樣，發生大規模的群眾示威或產生具有份量的反對團體。究其原因何在？為何索菲亞也難逃民主變革的衝擊？茲就政治、經濟和社會等方面的背景因素加以分析，即可洞悉其梗概。

(一) 一黨專政易生腐化

戰後保加利亞共黨政權，從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到一九八九年十一月為止，在四十三年之間，僅僅更換三位領導人，其中以日夫科夫在位時間最久，長達三十五年，算是東歐共黨國家當中掌權最長者。自蘇聯領導人赫魯雪夫至戈巴契夫，其間歷經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和契爾年科等不同領導特質的蘇共領袖，日夫科夫均能屹立不搖，未受影響，他顯然有一套因應之道，為其他東歐共黨領袖望塵莫及。

在日夫科夫之前的兩位保共領導人分別是季米特洛夫和契文科夫 (Vulko Chervenkov)。季氏出身工人家庭，是一位工運狂熱份子，一九二〇年代代表保共赴莫斯科參加「第三國際」大會。此後他在共產國際中甚為活躍，三十年代曾負責主持各國的「人民陣線」運動，並入籍蘇聯。一九四六年保共在蘇共的支持下取得政權後，季米特洛夫即接掌黨政大權。季氏在

註⑩ 世界知識年鑑，一九八八年，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一九八八年，頁三八九。

位三年，因其親蘇的國際派背景，整肅異己，為保國爾後的親蘇路線立下堅實的基礎。一九四九年七月二日季氏逝世，由契文科夫繼任。契氏是一位史達林主義者，曾追隨季氏多年兼貼身侍衛。他上台後即大舉整肅保共中以高斯托夫（Traicho Kostov）為首的本土派。同年十二月，高斯托夫被控反革命等多種罪名判處極刑。其後，在短短一年內，至少有十萬保共黨員遭開除黨籍處分，部份高幹則被處死或送往勞改營^⑪。

一九五三年史達林去世後，赫魯雪夫上台，蘇共隨即修改史達林路線，並要求保加利亞亦應跟進，並採黨政「雙頭馬車」分由兩人負責。因此，在一九五四年保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中決議，契文科夫將總書記讓給日夫可夫。一九五六年二月赫魯雪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批判史達林，而掀起所謂「批史」運動。同年四月日夫可夫在中央全會中立即予以呼應，迫使契文科夫請辭。日夫可夫一九一一年出生於農家，十七歲加入共黨，二次大戰期間參加反納粹游擊戰。憑著他農民特有的敏銳直覺和幹勁，步步高升，不久之後即集保國黨政大權於一身。日氏在位期間，無論是內政或外交，一直保持相當彈性的策略，少有僵化的教條主義色彩。在國內，從上台之初即力圖擺脫史達林主義的陰影，於一九五七年適時進行「清黨」運動，避免重蹈一九五六年匈牙利革命的覆轍。一九六四年赫氏垮台之後，這位保共領袖的地位尚能自保。六〇年代，相對於其他東歐國家，日氏對文學、藝術等文化活動的寬鬆政策，比較能獲得知識份子的認同^⑫。因此，一九六八年捷克出現的「布拉格之春」，保國並未明顯地受到波及。七〇年代，由於歐共主義（Eurocommunism）盛行一時，加上赫爾辛基最後文件有關人權條款的衝擊，使東歐各國共黨政權備感不安。一九八〇年，波蘭即因經濟危機日趨嚴重，而爆發了轟動一時的「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此時，日夫可夫雖敏銳地察覺到人民物資需求的重要性，特別將生產民生物資列為優先，俾滿足人民生活最起碼的需求，以防患於未然。但共黨「一黨專政」沈疴已深，積弊難改，註定要被民主潮流吞沒。

（二）社會主義經濟的貧困

戰後保共政權建立後，隨即積極展開史達林模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行農業集體化、企業國有化，並全力發展重工業。

首先，就農業集體化來說，在傳統上以農立國的保加利亞實行起來，當然受到相當大的阻力。當一九五二年保共宣布第一個五年計畫（一九四九—一九五三年）提早一年完成時，工業生產指標達到預期的百分之八十，農業則只有百分之六十一

註⑪ 李邁先，東歐諸國史，台北，三民書局，民國八十年再版，頁五三四。

註⑫ 同註⑪，頁五三七。

⑬。其主要原因，乃因農民拒絕把耕地轉移到集體農莊。當時保共頭子契文科夫不得不採用高壓手段，一方面課以重稅和禁止私相轉讓，只容許轉讓給集體農場；另一方面實施恫嚇或毆打，甚至隨意逮捕等。因此，集體化的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才完成。保共推展農業集體化的政策並不很順利，農民經常以屠殺牛馬、怠工或焚燒穀物等方式進行消極抵抗。其次，就企業國有化方面來說，由於保國赤化之初，企業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比例不高，規模也不大，因此，在推行國有化之際並未遭到明顯的反抗⑭。

史達林的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模式，其主旨即在集中力量發展重工業，以加速現代化。保共第一個五年計劃開始就企圖改變產業結構，優先發展重工業、動力工業和化學工業等。可是，以一個農業國家要在短期間內實現工業化，必須要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當一九五三年史達林病故後，保加利亞隨即發生農民騷動，迫使契文科夫改行所謂「新路線」(New Course) 政策，略增消費物品生產和提高工人、農民各種福利才勉強渡過難關⑮。

日夫可夫掌權後，首要職責是，在一九五八年完成農業集體化；同時，在該年的保共代表大會中通過被指稱為「中共式大躍進」的第三個「五年計劃」(一九五八—一九六二年)，計劃工業生產在一九六五年之前增加四倍，農業產量則在一九六〇年底前增加三倍。但事後證明，此一計畫過於樂觀，估計偏高，並未真正達成⑯。不過，一九六四年以後，日夫可夫的經濟政策，無論是工業或農業，都頗富彈性，帶有創造性，且績效顯著，有些地方甚至不受馬列教條束縛。最明顯的例證，如在工業方面，他並不自目發展重工業，以吸收先進技術為目標，容許與外國合作生產。其合作對象不光是以蘇聯為首的「經濟互助委員會」成員，而且也包括德、法、荷及北歐國家。據一九七五年的統計，此種合作生產的工業產值約占工業生產總額三分之一⑰。其工業技術至七〇年代末已達到能自行製造電腦精密零組件的水平。因此，保國對進出口貿易的依賴程度也與日劇增，日氏先行擴編合併農莊，並且企圖使工業與農業相結合，把工業管理方法與技術應用到農業。此即一九六八年保共提出的所謂「農工聯合」(Agro-industrial Combines) 經濟政策。至七〇年代這種聯合經營採用三種形式：其一，農工綜合體 (Agro-industrial Complexes)；其二，工農綜合體 (Industrial Agricultural Complexes)；其三，科學生產綜合體 (Scientific Productive Complexes)。每一綜合體至少有五、六個農莊，並選定其中之一為行政中心，使這一

註⑬ 同註①，頁五三五—五三六。

註⑭ 同註①。

註⑮ *Osteuropa*, Nr. 2 · 3 / 89, pp. 260—268.

註⑯ *Ibid.*

註⑰ *Ibid.*

中心逐漸形成一座小城鎮。此一規劃不僅可集中生產某種特定作物，而且可發展工業，其附帶功能尚可使農村人口不再流入都市，農工界限消除，農民轉換為工人，更有利於共產黨的統治¹⁸。

一九七〇年代末，日氏更提出所謂「新經濟模式」(New Economic Model, 簡稱NEM)頗引人側目。其重要精神包括有：非中央化、民主化、內部競爭、重視市場機能和自給自足等¹⁹。在此一新模式運作下，一九八〇年代初期，索菲亞當局似乎充滿信心，開始實施的績效頗有進展，人民生活普遍改善。可是，好景不常，没多久經濟又轉趨萎縮。其主要原因是產品競爭力仍比不上西歐先進國家，與西歐合作生產的產品就是因為品質不良，喪失競爭力。其實，究其關鍵因素，乃是日夫可夫的任何經濟改革模式，依然在計畫經濟的框框裏打轉，與匈牙利一九六六年的「新經濟機制」(New Economic Mechanism)並無多大差異，其成效畢竟有限。布達佩斯當局最終也得要面對現實改弦易轍，大刀闊斧進行改革。由此正可證明，社會主義經濟的貧困性。

(二) 戈巴契夫「新思維」的衝擊

儘管日夫可夫當政期間，在追隨莫斯科步調之餘，其對外政策也展現了某種程度的靈活性，但當戈巴契夫揭槩「改造」與「公開性」的創新政策後，日氏則持謹慎保留態度，企圖敷衍，却又不敢明目張膽地公開抗拒。不過，由於地緣和語言相通的關係，戈氏劃時代「新思維」的資訊，很快地由蘇聯和西方媒體傳遍保國境內而立即引起了深遠的影響。尤其一九八九年波蘭和匈牙利民主化運動的順利進行，更大大地鼓舞保加利亞民心，進而激發了有識之士推動改革的強烈意願。一九八九年，當法國總統密特朗訪問保加利亞前夕，日夫可夫接受世界報訪問時曾自豪地說：「你們可知道，是我首先在保加利亞提出幹部任期限制，我們建議領導幹部可連任兩次，每任五年，我們的建議幾乎被所有社會主義國家採納。²⁰無疑地，日氏的洋洋得意，正反映了他與時代潮流脫了節，同年十月二十九日，素以敏銳見長的日夫可夫業已感受到來勢凶凶的民主改革浪潮勢不可擋，乃正式承認政治多元化的事實，說這是「每個文明社會所必要的發展」²¹但此時對一位近八十高齡的保共領導人來說，已難力挽狂瀾，註定要喪失權勢，被迫下台。

保加利亞社會反對力量的匯集，乃乘著一九八九年十月「歐安會」成員代表雲集索菲亞召開環保會議之際，由一個剛成

註¹⁸ Ibid.

註¹⁹ 同註¹⁸，頁五四、五五。

註²⁰ 大公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七日，第三版。

註²¹ 星島日報，(香港)，一九八九年十月二十日，第二版。

立以環保為名的團體「生態公開」(Okolo Glasnost)率先帶領發難，向國會提出請願書，要求民主與環保，人權，表達對保共領導階層的不滿，反對力量藉「歐安會」環保會議所帶來的開放氣氛，借機活動，以舉行記者會和示威遊行等方式號召民意，要求加速改革²²保共領導階層為了顧全顏面與國家形象，一反過去，並未對這些抗議活動加以干預或鎮壓，反而作了若干讓步，包括放寬某些異議份子回家的限制，及准許「自由歐洲電台」記者的採訪。²³自此之後，歐安會議中的人權理念不僅得以深入保國人心，同時，一向飽受折磨的異議團體有機會公開活動，凝聚力量，並普遍獲得人民支持，終能成爲一股足以與共黨抗衡的勢力。

綜觀保加利亞民主化的背景，用日夫可夫的話來說，他一生當中都想爲國家爲人民貢獻心力，但他所要追求的目標，其前提犯了嚴重錯誤²⁴共產黨徒自以爲要把人類帶到共產主義社會，首先就要改變人性，而改變人性就必須從兩方面著手：其一，通過階級鬥爭，消滅階級社會；其二，實行公有制。前者，共產黨假借無產階級專政之名，行一黨獨裁之實；後者，以中央指令性計劃經濟，掌握所有國家資源。共產黨在這樣的前提下，既改變不了人性，反而喪失民心，激發人民的不滿情緒。因此，當戈巴契夫的「新思維」點燃共黨世界民主的火花後，星星之火即刻在鐵幕燃起，毫不留情地把共產黨嚴密建築的所謂「社會主義天堂」化爲歷史的灰燼。

四、民主化進程與特徵

在共黨「一黨專政」體制下，共黨「唯我獨尊」，不容許一向被視爲「反革命」的批判或反對聲音存在。在這樣的環境下，如果没有內外因素相互呼應，政治邁向民主化談何容易。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一九六八年的捷克「布拉格之春」，乃至一九八〇年的波蘭「團結工會」自由化運動等，都是因爲欠缺外在大氣候的配合與奧援，使得民主的生機胎死腹中。保加利亞在七〇年代曾一度出現自由化傾向，但也無疾而終。當時負責文化政策的是日氏的女兒麗尤米拉(Ljudmila Zhivkova)他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思想較爲開明，頗能拉攏自由派文化人士。不過，日氏却在一九七七年對保共中具有自由主義傾向的黨員進行開刀。據估計，被革職的各級幹部多達三萬八千多人，包括其得力助手威爾契夫(B. Velchev)。因而導致一九七八年出現一份模仿捷克知識份子所發表之「七七憲章」(Charter 77)的所謂「七八宣言」(Declaration)²⁵。

註²² 自立早報，民國七十八年十月二十六，第十版。

註²³ 同註²²。

註²⁴ Osvetovoda Nr. 3 / 90, pp. 248 ~ 254.

註²⁵ 李邁先，前揭書，頁五三九。

雖然沒有產生立即影響，但已種下爭自由的火苗。

保加利亞的民主化脚步，比較明確的跡象，基本上是在一九八九年下半年開始。為了敘述方便，特就其民主化進程的某些具體作為劃分為如下三個時期：(一)民主化萌芽時期；(二)民主化成長時期；(三)民主化茁壯時期，俾有助瞭解保國在「非共化」過程的全貌。

(一) 民主化萌芽時期（一九八九年十月至一九八九年十一月）

一九八九年二月，波共與「團結工會」召開歷史性的圓桌會議，經過八週的談判終於達成協議，隨後於六月舉行戰後東歐國家首次有比例限制的自由選舉，可謂在東歐正式敲響了自由的鐘聲。與此同時，匈牙利共黨領導階層在完成權力結構改組後，洗刷歷史冤案，也在六月平反一九五六年納吉（Imre Nagy）事件，還其清白，並認定該年的抗暴運動為「人民起義」，而非「反革命」；其後，匈共在黨大會上，更打破共運史上的先例，宣佈廢黨，與馬列主義決裂。顯然地，波、匈兩國驚人的創舉，對保加利亞人民自然起了相當積極的示範作用。

揭開保加利亞的民主化序幕，應該歸功歐安會在十月於索非亞舉行為期二週的卅五國環保會議，讓異議團體得有拋頭露面的機會，敢向保共當局要求改革。當在歐安會環保會議召開期間，雖然有社會反對力量的出現；但一般認為日夫可夫的地位仍是穩定的；甚至當一九八九年十月底他發表必須實行政治多元化之聲明時，外界還以為是日氏本人在主導整個改革運動。不料，數週後這位深具堅韌生命力的共黨頭子却黯然下台。保共內部的改革無疑是由當時保國外交部長，也是日氏親信的姆拉德諾夫主導，並得到戈巴契夫襄助。顯然一向對蘇聯忠心耿耿的保共，在戈巴契夫開放政策的大力衝擊下亦自然而然地形成「改革派」與「保守派」。而保守派之所以必須下台的原因，與其說是拒絕改革，不如說是老邁與改革步調遲緩所致。改革派大多五十出頭的年紀，均留學過蘇聯，受蘇聯影響很大。他們對於保守派的改革時間過於緩慢及範圍太狹隘頗為不滿。一九八九年十月底，戈巴契夫在致函各國共黨領袖時，即懷疑日夫可夫的改革誠意，並譴責他將把保加利亞帶向災難。²⁶ 開啟保共內部變革的關鍵人物是姆拉德諾夫，他在十月二十五日秘密向政治局遞出辭呈，並在信中列舉三項理由：第一，批評日夫可夫越來越奢華的個人生活方式和引人側目的裙帶關係。第二，認為錯誤的經濟政策使保加利亞陷入困境。第三，對土耳其少數民族政策的偏差。有關第一點，例如日氏搞個人崇拜，使議會變成執行他個人意志的工具；企圖讓其兒子繼承他的職位，並批評他兒子在國外的荒唐行徑等。有關第二點，例如許多談了多年的經濟改革都只是紙上談兵，造成經濟日益惡

化，最顯著的例證，一個傳統的乳酪生產國，人民却買不到乳酪；理論上所謂自主的企業仍須等上方指示；私有企業則無法律保障，稅制混亂等。至於第三點，則由於強迫同化政策的偏差使他必須常常為保國的少數民族政策辯護；一九八九年五月土保邊界開放後，一下子有三十二萬人湧向土耳其，造成經濟上嚴重的損失等。儘管如此，日氏似仍未察覺地位不穩的同年十一月初姆拉德諾夫仍按稍早預定的行程往訪北平，回程時曾在莫斯科停留，據信是與戈巴契夫討論日夫可夫下台之事，並尋求他的支持。十一月八日在政治局委員會中，首先由總理阿塔索夫（Georgi Atanassov）發難，他重複日氏在十二個月前提出辭呈之事（在當時只是形式），要求他辭職。此時日夫可夫的支持者費黑里波夫（Grischa Filipow，前總理）、巴雷夫（Milko Balev，為齊氏左右手和個人秘書）及史托亞諾夫（Dimitar Stojanow，前安全機構頭子）群起反對此一提議。但此一提議獲得國防部長朱什諾夫（Dobri Dshunow）及姆拉德諾夫支持。日夫可夫本人則威脅要把「叛徒」解職。但按華沙公約規定，日氏若將國防部長解職，必須得到華約同意，而朱什諾夫等有戈巴契夫在背後撐腰。接著姆拉德諾夫亦報告他與戈巴契夫會談的經過，於是日氏的下台遂成定局。十一日日氏宣布辭去總書記與國務委員會主席職位，接替者為外交部長姆拉德諾夫²⁸。隨後自然是一連串的人事改組，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中的許多所謂「日夫可夫黨」紛紛去職，包括以攀附裙帶關係而任公職者。

（二）民主化成長時期（一九八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九〇年七月）

保加利亞民主化的快速進展，顯然是受波蘭、匈牙利、東德等東歐國家民主變革的衝擊，而產生了「骨牌效應」。

日夫可夫垮台，姆拉德諾夫上台，無疑只是保共內部鬥爭的結果，雖然姆氏似乎被認為是一個開明的改革派，但從他被選為黨領導後發表的談話可知，他的改革亦有其限度。他強調保共未來仍是保加利亞的主導力量，中央委員會的角色將持續加強²⁹。這位保共新秀並且引用列寧的話說，共黨乃是國家穩定的主要支柱，其任務在於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雖然他一開始即主動願與知名的異議人士展開對話，並為日夫可夫時代的受害者平反，但人民對他的改革誠意有所懷疑。姆拉德諾夫上台那天，一位保國反對派學者葉里夫接受「法新社」電話訪問時即表示，日夫可夫辭職「是件大事」，可能導致「激烈的民主改革」。³⁰證之後來的發展，這的確是保加利亞民主革命的開始。

註27 同註24。

註28 同註24。

註29 同註24。

註30 同註24。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十八日，一場據估計約有十萬名群眾參加的和平集會在首都索非亞展開。這是保加利亞四十五年來最大規模的一次群眾示威。號召這次示威者包括人權和環保組織等九個團體。他們在安全部隊的注視下要求民主、自由和自由選舉。這次盛大和平的示威使保加利亞的改革急轉直下，由保共黨內的派系鬥爭轉化為一場全民性的民主革命。姆拉德諾夫在接受法國電視台訪問時即予回應，表示舉行自由選舉的可行性很高，他本人亦贊成。示威團體亦自行組成「公民團體」監督新政府的改革進展。^⑳十二月十日，鑑於保共改革步調緩慢，約有十萬群眾冒著嚴寒再度走上街頭，要求實施新憲法、新選舉和起訴前共黨頭子日夫可夫。這次是由十九個獨立團體聯合策動，聲勢浩大。姆拉德諾夫迫於強大的民意，不得不在十一日宣布憲法中共黨一黨專政的規定將予廢除，並保證在一九九〇年六月前舉行自由選舉。^㉑此後，保共與其他許多東歐國家的共黨一樣，在一波波強大的民意壓力下，為了圖存和贏得選舉而不斷變革，其中自然亦包括將黨名更改為「保加利亞社會黨」(一九九〇年四月三日)。

最能顯示保加利亞民主化的具體成果，則是一九九〇年六月十七日和十七日舉行兩回合的自由選舉。在這次大選中，保加利亞社會黨雖取得百分之四七點九的選票成為第一大黨，但並未享有絕對優勢，由異議團體組成的「民主力量聯盟」也以百分之三一點六的第二大黨進入國會(參見附表)。^㉒然而在學生仍不斷示威及反對黨不願與社會黨合組政府的情勢下，姆拉德諾夫終於在一九九〇年七月六日辭去總統職位。經過各黨派妥協後，八月一日，「民主力量聯盟」領袖謝列夫(Zhelev Zhelav)終於當選新總統，為保國戰後首位獲得領導職位的非共人士，也為保加利亞的共黨專政劃下句點。

(三) 民主化茁壯時期(一九九一年七月以後)

保加利亞在共產黨四十多年長期的極權統治下，儘管黨政軍一體壟斷國家所有資源，但最終仍無法保住其苦心孤詣得來不易的政權。即使保共企圖以脫胎換骨更改黨名，重整領導班底加快改革脚步，也難挽回民心。不過，甚為可取的是，保共改名社會黨向西歐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政黨看齊後，接受民主潮流的洗禮，敢於面對現實，使得保國在民主化進程上，穩當地邁開脚步，在東歐國家中獨樹一格，令人刮目相看。保加利亞民主化展現茁壯最具體的例證有之：

其一，建立民主制度，擺脫共黨統治陰影。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三日國民議會通過新憲法，這是東歐國家「非共化」之後，第一個採行西方式民主憲法的國家。新憲法明定保障私有財產等基本人權、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設憲法法院、國會

註⑳ 同註⑲。

註㉑ 同註⑲。

註㉒ Europe - Archiv, Folge 13-14 / 1990, p. 2131.

席次由四百席改為二百四十席。在國會表決中，贊成票數遠超過所需的三分之二多數票，但在四百位議員中有八十九位進行抵制，其中有二十五位反對黨議員在國會大廈門前絕食抗議，他們抗議的理由，認為新憲法規定不周，忽視對少數民族的保障。³⁴保國這部新憲法在社會黨控制的國會制訂完成，難免有瑕疵不够完善之處，但總的來說，這部憲法係由自由選舉產生的國會所制訂，已能反映民意，基本上已具備西方民主憲法的特色。

其二，落實民主政治，重新舉行大選。新憲法通過後，即在同年十月十三日重新改選新國會。在保國劇變後的第二次自由大選中，「民主力量聯盟」脫穎而出，獲百分之三四點三六，得一百十席，超過社會黨十得票率，成為國會第一大黨，社會黨在該次大選中，僅獲百分之三三點一四，只占議會二百四席中的一百零六席，已失去在上屆國會的絕對多數優勢。另外，由土耳其後裔為主的「爭取權利與自由運動」在國會中贏得二十四席（參見附表）。³⁵在這次大選裏，還一度被看好的保皇黨，企圖擁護頗得保人愛戴流亡西班牙的王室西梅翁二世，恢復君主立憲制，但這種已與時代脫節的政治主張，並未獲得選民認同，無法跨越百分之四選舉比例門檻而被淘汰。值得引人矚目者，從這次自由選舉中，共有六十一個政黨參與，其中有三十一個政黨組成九個不同聯盟參加競選，其餘則獨立競選³⁶，其結果，未出現如波蘭、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議會政黨林立現象，影響政局的穩定性。由此以觀，保國的政黨政治正朝著穩健的方向邁進。

其三，總統由選民直接選舉產生，新憲法的國家元首稱謂與產生方式，和舊憲法規定的由國民議會推選產生的國務委員會主席（即國家元首），大為不同，正式改稱總統，由人民直接投票選舉產生，以獲投票率二分之一以上始告當選，並增設副總統。一九九二年一月十三日舉行選舉，在第一回合的選舉中，由民主力量聯盟支持的候選人謝列夫，因只獲百分之四十選票，未達當選標準，須在一週後舉行第二回合選舉，再和次高票得百分之三十由社會黨支持的瓦卡諾夫（Velko Valkanov）決勝負。一月二十日的第二輪選舉，謝列夫終以百分之五二點八

註³⁴ 自由時報，民國八十年七月十四日，第十一版。

註³⁵ *Europa - Archiv*, Folge 21/1991, p. E227.

註³⁶ 台灣時報，民國八十年十月十四日，第九版。

保加利亞自由選舉結果

黨別	項別	選舉日期：1990.6.10/17		選舉日期：1991.10.13	
		得票率	國會席位分配 (共400席)	得票率	國會席位分配 (共240席)
社會黨 (BSP)		47.9%	211	33.14%	106
民主力量聯盟 (SDS)		35.6%	144	34.36%	110
爭取權利與自由運動 (DPS, 土裔)		5.9%	23	7.55%	24
農民黨		8.1%	16	-	-
其他		2.5%	6	-	-

五的得票率，擊敗瓦卡諾夫的百分之四七點一五得票率，成為保國有史以來首任民選總統。³⁷謝列夫在一九九一年七月接任保國元首時，就辭去民主力量聯盟主席，這次他在激烈的總統選戰中，粉碎社會黨分享部分權力的希望。謝氏當選後立即表示，「目前保國的首要工作為推動經濟改革，逐步謀求經濟中與社會的穩定」，他並承諾推動私有化政策、歸還財產、建立自由市場。³⁸由於索菲亞政府的民主化進程甚受肯定，乃於同年五月，繼匈、波、捷之後，獲准加入「歐洲理事會」(The Council of Europe)，成為歐洲民主國家行列的一員。

綜觀保加利亞的民主化進程，基本上可歸納下列特徵：

第一，拋棄共黨體制，重建多元的民主政治。過去因保共一手創建的制度或符號，一律被取消。如在形式上更改國號，把原「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改稱「保加利亞共和國」；其他諸如國旗、國徽或任何與共黨相關之標誌、街名和廣場等恢復原名；被保共奉為保國之父季米特洛夫的遺體，陳放在市中心總統府正對面的紀念館達三十年，也被迫焚化燒毀。在實質上，則制訂嶄新風貌的民主憲法，唾棄過去充滿意識形態色彩的條文，建立民主法治，保障基本人權，尊重多元文化。保國的民主化過程，展現和平理性，甚為難得。

第二，保共蛻變後，力量雖大不如前，但仍保持可觀的力量。波、匈、捷等三國的共黨在民主化的衝擊下，於自由選舉中僅能獲選民百分之十至十五的支持，喪失執政權力。反觀保共更改黨名後，在第一次自由選舉時，仍居第一大黨得繼續掌權；在第二次大選時，僅以稍微差數退居反對黨，尚擁有三分之一以上選民支持。這顯示保共蛻變後能順應潮流，反應靈活，尚充滿活力。

第三，反對力量有效整合，形成一股足以與共黨相抗衡的勢力。保共放棄「一黨專政」後，反對力量迅速結合，成立「民主力量聯盟」，產生了相當大的制衡作用。東歐國家在共黨垮台前後，反對力量的整合均甚突出，扮演舉足輕重角色，如波蘭的「團結工會」、捷克的「公民論壇」，但它們取得政權後，內部派系傾軋遂告分裂。「民主力量聯盟」雖由十二個政黨聯合成立，但其執政後尚可團結一致，以國家重建大業為重。

第四，國會未出現政黨林立局面，有助政局穩定。新國會按比例選舉門檻的限制下，三足鼎立，僅有「民主力量聯盟」和社會黨二大政黨，以及土耳其裔組合的「爭取權利與自由運動」組織，這種情況對初踏上民主道路的保加利亞政治發展頗

註37

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一年一月二十一日，第九版。謝列夫，現年五十六歲，哲學教授出身，曾加入共黨。但一九六五年因在博士論文中批評列寧主義理論而

被開除黨籍，此後即一再受到共黨當局的迫害。一九八二年謝氏出版一本名為「法西斯主義」的書，書中談的雖是極右思想的毒害，目的實在暴露共產主義的荒謬。該書遭到前獨裁者日夫可夫的查禁，但在一九八九年日夫被罷黜後，成為最暢銷書籍。

註38

同註37。

爲有利。波、匈、捷等國，其新國會政黨林立，必須組成聯合政府，對刻不容緩的改革事業，經常意見分歧，產生不少阻力。另外，諸如黨政分離、政經改革同時進行、平反歷史冤案、廢除特務系統、軍隊國家化等等，均和其他東歐國家雷同，不另詳述。

五、結 論：當前面臨的困境

從以上論述，這個巴爾幹半島國家歷史上找不到什麼民主傳統，戰後又長達四十餘年飽受共黨極權統治的蹂躪，民主生機幾乎沒有發展空間，惟一九八九年東歐民主風潮興起之後，這個瀕臨黑海的中小型國家，却快速地擺脫共黨的控制，穩紮穩打的走向民主康莊大道，並未出現如波蘭、捷克和斯洛伐克、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乃至南斯拉夫等國不同程度的危機。其主要原因，爲保國民風純樸，有多元文化的基礎，無形中減低了社會衝突的緊張情結，化戾氣爲祥和。作者在一九九一年七月間走訪保加利亞從事短期研究時，曾目睹國會議員絕食抗議場面，也聆聽反對黨聚集上萬群眾示威演說，秩序井然，印象極爲深刻。當時即有直覺的感受，認爲這個斯拉夫民族的民主化，要比波蘭更有希望。

不過，保國的民主化進程並不是從此高枕無憂，至少當前還面臨下列棘手問題亟待克服。首先，是經濟問題，自推動改革以來，通貨膨脹不斷上升，估計一九九二年仍有百分之二百五十的上升率，人民購買力大幅降低，失業率直線上升，已有百分之十二，加上外債高達一百十億美元，國際收支失衡，使人民對目前的生活極感不安和不满，對改革的耐心有限。³⁹今後，由「民主力量聯盟」領導的政府，如何加速私有化進程，帶動市場經濟的起飛，是當務之急。其次，是政治問題，由於新政府成員均是新手或過去的異議份子，欠缺行政經驗。最近又傳出總統、總理和國防部長之間，因武器交易和行政管理事宜失和，對國家情報局的歸屬問題，亦爭吵不休，以及是否在五年內禁止前共黨高幹擔任任何領導職務的法案和「非共產化」法案，內部意見尚難建立共識。⁴⁰爲此，「民主力量聯盟」嚐到權力之後，能否共體時艱，猶待考驗。最後，是社會問題，保國境內除了近百萬土耳其裔外，尚有爲數不少的馬其頓人。當南斯拉夫因民族問題而引發聯邦解體，是否會鼓舞土裔要求自治，或馬其頓族的合併，多少潛存不穩定因素。再者，環保意識高漲，保國境內二座切爾諾貝利型的核電廠，不符合安全標準，保國人民備受心理威脅，停止發電或另謀能源，短期內都不是索菲亞政府能力所及。總之，保國人民已感到自由民主的滋味，但目前亟待西方伸出援手，增補養分，始能健康成長。

註39 同註37。

註40 世界知識半月刊，一九九二年十二期，頁十一。